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党的一大前后	1
学习社会发展史	7
《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	30
《实践论》解说	41
怎样学习《实践论》?	119
读毛泽东同志 1926—1929 年的四篇文章	135
怎样学习党史?	148
读《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160
读《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166
《矛盾论》解说	175
湖南自修大学是训练干部的学校	375
《矛盾论》——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	377
怎样学习《矛盾论》?	395
谈宪法	404
热烈参加宪法草案的讨论	425
我国宪法是人民革命成果的保障和为社会主义 斗争的旗帜.....	430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42
宪法及宪法之史的考察	461
我国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488
谈“百家争鸣”	517
纪念伟大的孙中山先生	528
怎样做一个社会主义大学生	
——给应届高中毕业同学的信	52
十月革命与中国知识分子	533
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540
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	55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564
七一回忆	610
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论	618
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论	654
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	
——为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而作	712
给中央档案馆的一封信	720
谈办好高等学校问题	723
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	
——为纪念党成立四十周年而作	729
怎样学习毛泽东思想	738

党的一大前后^{*}

一九二〇年春季，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一个代表来到中国。他的名字是 Vitinsky，我们替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吴廷康。他是和他的夫人同来的。他以前在美国做过工人，英语说得很好。东方局认为他比较了解东方情况，所以派了他来。他说，东方局曾经接到了从海参崴发去的电报，说中国曾经发生了几百万人的罢市、罢工、罢课的大运动，所以先派吴廷康到中国来调查和联络。他首先到达北京，和李大钊等数人交换意见。当时苏联宣布废除沙皇压迫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一般知识分子都对苏联有好感，所以新文化界人士到处请吴廷康讲述苏联情况，对于当时象云雾一般的苏联，有了相当的了解。特别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更喜欢与吴廷康相联系。当时充任英文翻译的人是张太雷。由于李大钊的介绍，吴廷康到了上海，首先访问了新青年社的陈独秀，任俄文翻译的人是杨明斋。当时上海著名的赞成社会主义的人，有星期评论社的沈玄庐、李汉俊、戴季陶（他后来被孙中山骂了回去）、陈望道、施存统，有共学社的张东荪。吴廷康就常和这些人相联络，讲述苏联的情况，并交换关于革命的意见。这时，设了一个外国语学校（地址是渔阳里二号），由吴廷康的夫人教授俄文。当时脱离家

• 这是李达同志 1949 年写的自传的一部分，1980 年第 5 期《新时期》首次公开发表，标题是《新时期》编者加的。

庭的找自由的青年学生，都被介绍到这里住下，并学习俄文。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吴廷康就劝陈独秀、李汉俊等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最初本想邀约张东荪参加发起的，陈独秀认定他是研究系的，颇有旧政客的臭味，所以没有约他。（他主编着时事新报，也曾主张社会主义，但后来在中共组成后，他开始反对社会主义了。）

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就邀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八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都来参加。首先拟定一个类似党章的东西，是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格纸写的。所谓党纲，只有“劳工专政，生产合作”八个字。首先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另外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S. Y.）。于是由陈独秀函约李大钊在北平组织，王乐平在济南组织（王只介绍了济南五中三个学生组织，他自己未参加）。陈公博在广州组织，毛泽东在长沙组织，张申府在法国组织，施存统在东京组织，武汉的组织，是李汉俊自己回去组织的。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

当时党的工作只有两种，第一是宣传主义，第二是组织工人。宣传的刊物两种，一为《新青年》月刊，是公开的，主要的是讨论社会主义，由陈独秀主编。一为《中国共产党》，是不定期刊（因没有经费，只出了两期），主要是主张社会革命，由李达主编，其第一期第一篇文章，是我所写的中国社会革命之商榷。至于组织工人的工作，是由李汉俊主持的，当时派李中（原为S. Y. 后升为C. P.）在杨树浦进行组织机器工会，李启汉（原为S. Y. 后升为C. P.）在小

沙渡进行组织纺织工会。十一月间，陈独秀应孙中山之邀，去广东担任教育厅长，由李汉俊代理书记，并主编《新青年》。同时，吴廷康也回到苏联去了。这时候，经费颇感困难，每月虽只用二三百元，却是无法筹措。陈独秀所办的新青年书社，不能协助党中经费，并且连李汉俊主编新青年的编辑费（每月一百元），也不能按期支付。于是我们就和沈雁冰（当时他任商务小说月报编辑，也加入了）商酌，大家写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把稿费充作党的经费。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就与陈独秀闹起意见来。

一九二一年三月，陈独秀拟了一纸党章草案，寄交李汉俊，其中关于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关于工人的组织，主张组织产业工会。李汉俊指斥陈独秀要实行党的独裁，而主张地方分权制，对于工人组织，则主张先组织职业工会。他根据他的意见，也拟了一个党章草案，寄给陈独秀。陈独秀看了之后，非常气愤，就一面写信和李汉俊打笔墨官司，一面写信劝我反对李汉俊。我当时觉得党刚才发起，只有那么几个同志，就闹起分裂来，未免太不象样，我只得周旋于陈李二人之间，极力弥缝他们之间的裂痕。可是李汉俊余怒未息，不肯代理书记，就把党的名册和文件交给我，要我做代理书记，我只好接受下来。当时党的工作，因为缺乏经费，都暂时停顿，只有《新青年》月刊仍旧继续出版，我们就在《新青年》写稿子。当时梁启超派办了一个名叫《改造》的杂志，登载了反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文章（题名我忘了），同志们认为必须予以驳斥，推我担任写一篇文章，我做了一篇题名《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月刊上。据各地同志说，那篇文章颇有积极效果，其实现在看来，是十分幼稚的。

这一年春季，我到中华书局新文化丛书部，担任编辑，校阅了我所翻译的《社会问题总览》和《唯物史观解说》。此外我还翻译了一本《女性中心说》，和一本《中国关税制度论》，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四月间，我和我的妻子王会悟由相爱而实行同居，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同志们纷纷责难，我们置之不理，但到后来，许多同志们都照样实行了。

六月间，第三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可洛夫两人来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洽了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告中共的正式成立。当时党的组织共有七个地方单位，我发出了七封信，要各地党部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七月一日下午七时，在上海贝勒路同益里李汉俊寓所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的共十二人，上海——李汉俊、李达；北京——张国焘、刘仁静；武汉——董必武、陈潭秋；长沙——毛泽东、何叔衡；广州——陈公博；济南——王烬美、邓恩铭；东京——周佛海。共计出席代表是十二人。马林和尼可洛夫都出席。开会时，马林首先用英文演说，大意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很有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的支部，苏联布党添了东方的朋友，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他在演说中，强调着要致电第三国际，报告中共的成立。他简单的致词之后，正在开始作报告之时，忽然有一个生疏人闯进了会场。我们问他“找谁”？他随便说了一句“找某某”，我们答说“这里并无此人”，他就仓忙的走了。当时马林很机警，认为那个生疏人非常可疑，立即命令我们赶快走避，他和尼可洛夫先走，我们也跟着散开了。果然，不到一刻钟功夫，法租界巡捕房派了两辆卡车来到同益里，立即有巡捕把住弄门，另有两个法国巡捕跑进

屋内，当时只有李汉俊一人在家，他是能说法国话的，经接谈之后，才知道他们是来捉共产党的，但到处查看，除汉俊外并无别人，法巡捕房的人也就走了。这真好险，假使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了。这是因为马林用英文大声演说，夹杂着说了好几次中国共产党，被法国巡捕听去了，所以才有那一场风波。

从第一次聚会以后，代表们就寄住在博文女校内，互相交换一些经验和意见，对于党的工作如何进行，没有多加讨论。当时成为争论的一个问题，只是关于议会政策的问题。此外，大家都认为应在各地方从事组织工人的运动而已。这时候，党代表中多半带有浪漫的气氛，见面时总要谈到恋爱的故事。当时毛泽东同志却始终沉着，常常独自一人，搔首寻思，绝不他顾，同志们见了他这种神气，总说是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毛泽东同志后来做全党领袖的作风，在这时已经显露了端倪。

为了开会的安全起见，我们嘱托王会悟在嘉兴布置了一个会场。这会场是南湖中游湖的大画舫。时间从上午十时起，到下午六时。讨论的议题，主要的是讨论党章和工作方向。在党的组织方面，分中央与地方，中央设书记、宣传主任与组织主任，地方的组织也分设这三部分。宣传方面，仍照旧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机关，以《中国共产党》为秘密宣传机关。组织方面，重在工运，以上海、武汉和京汉、陇海两铁路为中心。其次，讨论宣言的草案，这宣言草案，第一句是“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接着分析中国的时局，认为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和广东的国民党政府都应在打倒之列，有所谓“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的文句，因而主张实行社会革命，建立劳工专政，中国才有出路。这个宣言，曾载《中国共产党》第三期中。最后选举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

为组织主任。于是中共正式成立，宣布散会，各地代表分别回去。

九月间，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厅长，回到上海，专任党中央的书记，常与马林、尼可洛夫会商。当时决定，在宣传方面，仍以《新青年》为公开机关，由陈自己主持，我则继续编辑《中国共产党》（从第三期起至第七期止），另主编人民出版社丛书（计出版《第三国际宣言与决议案》、《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苏维埃论》、《共产党星期六》、《哥达纲领批判》等十余种）。另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张国焘主持，他干了三个月，就停办了。

学习社会发展史*

第一节 学习社会发展史的意义

我们学习社会发展史,就是要学习马列主义的社会观,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社会观。

现在是人民世纪了,世界是人民的世界,中国是人民的中国了。由于人民革命的胜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的前史就宣告结束,而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历史就从此开幕了。从此,我全中国人民要使用我们全部的劳动能力,一笔一笔的写下我们自己的历史。

我们要怎样使用全部的劳动能力去写下自己的历史?去创造新的中国?首先就要搞通毛泽东思想,接受毛主席与中共的领导,向着新中国的前途,努力迈进。

我们要搞通毛泽东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但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基本的总路线,是可以学会的。这基本的总路线,就是毛泽东的中国社会观。

中国人民,昨天还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今天已经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明天还要走向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 李达同志任湖南大学校长时主编了《社会发展史》一书,湖南大学1951年印行,本篇是李达同志执笔撰写的《绪论》。标题是编者加的。

的境界。这条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康庄大道，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的总路线，即毛泽东的中国社会观。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因之，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社会观是马列主义社会观在中国社会的应用与扩张，是它的具体的表现，是它的一个分枝，所以我们要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社会观，必先学习马列主义的社会观。

马列主义的社会观告诉我们：社会的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是劳动创造世界的历史，是劳动者生产斗争的历史。这社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质不相同的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第一个阶段的原始社会是无阶级的社会。这一阶段的期间是很长远的。假定人类的历史经历五十万年，这第一阶段就经历四十九万余年之久。在原始社会的初期，人类的生产力极其幼稚，人人都是劳动者，他们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事实，没有阶级的区别，因而也没有国家机关，没有法律制度。但是到了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逐渐发展，由于农业畜牧业与手工业的分工，由于交换的发生，由于私有财产的形成，社会就发生了奴隶制，分裂为奴隶主与奴隶的阶级对立。由于阶级冲突不可调和的结果，奴隶主这一阶级，便利用自己阶级的权势，组成了一种公权力机关即国家，作为压迫奴隶阶级的工具。于是原始社会告终，出现了最初的阶级社会即奴隶制社会。

奴隶制社会成立以后，人类的历史就变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奴隶制的成立，推动了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在这一点，比较原始社

会是进步的。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不堪奴隶主的压迫和剥削，就不断的对奴隶主实行残酷的阶级斗争，只因为奴隶不是新生产方式的担负者，所以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奴主两阶级的同时消灭，因此奴隶制社会宣告终结。

历史上代替奴隶制社会而出现的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建筑在封建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对立之上。前者是压迫与剥削的阶级，后者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这封建社会比较奴隶制社会是前进了一步的。农奴是半解放了的奴隶，比较单纯的奴隶要自由些。从此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就代替了奴隶对主人的阶级斗争。随着封建的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与商业也发展起来，因而出现了工商业者的阶级即资产阶级。他们创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就取得了超出封建地主的经济的优势。于是这一阶级就利用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发动了对封建阶级的革命斗争，结果终于战胜了封建阶级，爬上了统治阶级的宝座，建立了资产阶级国家。于是资本主义社会就代替了封建社会，登上历史的舞台。

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上最后的阶级对抗的社会，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抗的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便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由经济斗争转向于政治斗争，转向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最后就必然取得胜利，终结资本主义社会而树立社会主义社会。这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规律，已由苏联十月革命证实了。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地主资产阶级的势力全被推翻了。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加强与经济建设成功，苏联早已进到了社会主义时代。

随着资产阶级残余的肃清，苏联无产阶级的自身也被扬弃了。苏联现在已经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事实了。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鼓舞了全世界劳动人民都要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一切民族都要到达于社会主义——这是马列主义社会观的普遍真理。但这一普遍真理，在世界各个民族的社会中实现起来，就具有特殊的特征和相貌。一切民族并不是精密的循着完全相同的途径而到达于社会主义的。从这里，就发生了马列主义社会观的具体应用的问题。

“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这一伟大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在其中国社会观中显示了辉煌的范例。

毛泽东同志在其《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说：“中华民族的发展（主要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大民族一样，经过了若干万年平等而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生活。而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的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五千年之久。”他叙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详细地分析了自周秦以迄鸦片战争的三千年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指出周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秦朝至鸦片战役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这长期的封建社会是农民阶级与封建阶级对立的社会，封建阶级对农民阶级进行着“残酷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曾经不能不在历史上掀起无数次的农民暴动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而这无数次的农民革命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但“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与革命后被地主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

具”。“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关系，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这种情况，直至近百年来，才发生新的变化”。

他接着分析鸦片战役以后百年来的中国社会的新变化，叙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的过程，封建经济解体的过程，买办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和民族资本发生发展的过程，因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也从此产生了。他详细的分析了上述诸过程之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与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中国社会的性质既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那么，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要经由怎样的途径呢？这个途径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联合农民阶级，团结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革命胜利以后，就建立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我中国人民，就要遵奉共同纲领，竭尽我们的劳动的能力，为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各种政策而奋斗，以期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而走向于社会主义。

基于以上的说明，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的中国社会观，是中

国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的总路线，是马列主义社会观的普遍真理在中国社会的具体的应用与扩张。它不但是中国民族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达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理论，并且是一切落后民族到达于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所以我们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的社会观，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社会观，才能理解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才能自觉的为这一革命建设而奋斗。

这是我们学习社会发展史的一点意义。

其次，我们学习社会发展史，就是为的要重新估定历史的价值。

过去的历史，是人类社会的前史，是劳动人民的前史。我们和我们先代的劳动人民，是处在反动统治者剥削者的践踏之下生活过来的，我们人民还是在昨天刚刚翻身站立起来的。回想我们前几代前几十百代的劳动人民祖先，一直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受着主人的压迫和剥削，受着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近百年来更受着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和剥削。古今的那些压迫者和剥削者，受着劳动人民的供养，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却一直贱视着劳动人民，替人民加上“皂”、“隶”、“舆”、“台”、“臣妾”、“小人”、“庶民”、“子民”、“奴仆”、“黔首”等一连串的鄙视的称号，他们替自己加上“皇”、“帝”、“王”、“公”、“侯”、“伯”、“子”、“男”、“卿”、“大夫”、“神”、“圣”、“君子”、“士绅”、“老爷”等一系列尊贵的头衔。人民甘受他们压迫和剥削的则称为“良民”、“顺民”，反抗他们的压迫和剥削的，则称为“乱民”、“莠民”、“匪徒”、“败类”。他们所写的历史，是歪曲事实的历史，是记录自己屠杀人民剥削人民的历史。人民反抗他们的革命历史，他们则诬称为匪徒谋乱史。在中国的长期

封建社会里，由于“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曾经不能不在历史上掀起无数的农民暴动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黄巾、铜马，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但过去统治者的历史上，都把这些农民战争诬为“匪乱”，为“匪祸”（其中刘邦与朱元璋因后来欺骗农民取得皇帝宝座而除外），口诛笔伐，无所不用其极。现在我们要把这类历史加以改编了，这数千百万的先代的人民，是革命的先烈，是历史的主人，我们要洗清他们所蒙受的污名，表扬他们的丰功伟业。我先世的劳动人民，不但反抗封建阶级的压迫与剥削，还反抗异种民族的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驱逐他们的势力，而又能与异民族的人民和平相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对于外来民族的压迫，都是不愿意的，都要用解放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的。他们只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毛泽东）我们现在要表扬他们，继承他们反压迫反剥削的光荣传统。

毛泽东同志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七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二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板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些都是我古代伟大的劳动人民的业绩。可惜被封建阶级把这些发明和发现当作奇技淫巧而扼杀住了，不能继续的发展起来，因为这些是不利于封建的剥

削方法的。现在我们要表扬他们，师承他们的劳动创造的能力，在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中，努力发挥我们的创造性。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毛泽东），这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是属于我们劳动人民的。所以说：“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便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斯大林）

第二节 学习社会发展史的观点

我们学习社会发展史，既然是为了要理解马列主义社会观，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社会观，理解中国社会由半殖民地的境地到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因而要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的理论与政策，而自觉的自发的用高度的热诚使用全部劳动能力，为创造新中国的前途而奋斗；那么，我们在学习社会发展史的时候，就必须具备下列五种观点：

第一是辩证唯物的观点。依据辩证法的观点，世界一切现象或对象，都是互相连系着，互相制约着。这一发展规律，在历史方面应用起来，我们对于任何社会，任何社会思想，就不能单从某种要素或一定成见出发，而必须从这一社会现象或社会思想所由产生，并与它相联系的那许多社会条件出发，并且还要联系时间与地点。

我们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的。但单只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不够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如刘少奇同志所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之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之优良典型。……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的正确理论与政策。”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所由产生的历史的社会的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

其次，依据辩证法的观点，世界一切的东西，都处在不断运动和不断发展中，旧东西必然衰亡，新东西必然生长。这一发展规律，在历史方面应用起来，“当然，没有什么‘永世不移的’社会秩序，什么私有制和剥削制的‘永恒原则’，什么农民服从地主，工人服从资本家的‘永恒观念’。”（斯大林）所以封建制度要被资本主义制度所替代；资本主义制度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替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由社会主义前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所替代。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党大会的时候，全部党员仅有三十五人，出席的代表仅有十二人。那时代表中国人民革命的势力是何等的微小，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是何等庞大，两者是完全不能比拟的。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